

# 财足利兴 源远流长

——宝钞、老印与流水账

徐兵

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大致起源于明朝中叶，与西方银行出现的时间相当。中国早期的金融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唐朝的飞钱就是一封书札、钱庄私帖上的印章则完全是秦汉印章的延续，金融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在金融业的各个领地都有体现，譬如钱庄账册名称。

钱庄账册秉承了传统的书札式样，都是竖式右读，账册的名称也不统一，当时被指“雅俗不一”，今日看来都算近雅，因为俗的还在后面。

从1937年年初开始，钱业改用新式会计科目和账册名称，并于1938年1月1日起一律实施。如以前的“流水账”，也有称作“日流”、“滚存”的，1938年开始一律改为“日记账”，现在银行员工还会习惯性地日记账叫作“流水账”，源头就在这里。另外如“克存信义”，也简称作“克存”，即钱庄的定期存款；“利有攸往”则是钱庄的定期放款；“日增月盛”即是现在的“月结”账。这些名称笔者刚进银行时偶尔还会听到老法师脱口流出，现在则再难听到。另外还有“万商总清”即现在的总账；红利账则叫“利益均沾”等。这些名称既能贴切点出账册的实际内涵，又兼顾主客双方的权利义务，且还包含美好的愿望，堪称意味深长，文化气息浓厚。

“钱庄的红账是钱庄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或初三将上年度的盈亏状况向全体股东提出的年度决算报告，惯用红纸缮写，因此称为红账。”（《上海钱庄史料》P476、477页）红账的收方有资本等项，并不写明资本，而是写作“源远



大清宝钞

流长”；红账的付方有应收账款等项，则写作“合浦珠还”，用典巧妙。

“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源远流长”用在钱庄账册资本项下意思是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正是因为与资本的天然合拍，笔者发现“源远流长”四个字还被刻成印章并盖在大清宝钞的左下角，不禁略有好奇。

大清宝钞和大清户部官票，发行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当时正值太平军起义，更兼黄河连年决堤，清政府开支庞大，国库银根紧缺，因此发行纸币以应急。宝钞以制钱记，官票以银两记，两



「兴利图章」

者合称钞票，虽然在同治元年（1863年）停用，钞票的叫法却一直沿用至今。

在纸币上盖印章是传统的征信防伪手段，从宋朝的纸币交到至元通行宝钞、大明通行宝钞上都有，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银票所发行的私帖上也是如此，但是用印都有一定的规矩。“源远流长”盖在大清宝钞的左下角，这里是加盖落地章的地方——落地章也叫落款章，如文人书札末尾不仅用墨水书写自己的名号还要留下自己的印鉴一样，钱庄的落地章内容也是庄名，表明这张钱票的出票人是谁。

然而在大清宝钞上，这个位置盖的是“源远流长”，另外还有式样相同的“若合符节”、“节以制度”、“与时偕行”、“泉之始达”和“于物有济”等印，收藏界一般认为这些印均为闲章。然而笔者以为，这些印章出现在宝钞上，一定有其道理，不应该以闲章等闲视之，须知闲章不闲，宝钞及所有钱票上之印章一定有其必用之理。询之于钱币专家王允庭先生，先生正巧对此曾有

专文研究，并判定此类闲章其实是身兼防伪和记录两种功能，既是防伪角墨记，又是“宝钞领回后由填写号数的司号人员加盖”（王允庭：《朱白两相“印”——趣谈钞票上的印章》，载《银行博物》总第25期），即表明此张宝钞在何地流通。先生毕生浸淫于钱币一道，故能发人所未道，后学佩服。

“源远流长”一印，小篆字体略作印化处理，其中“透”字更作省笔，略去中间“口”部，法度未失，直追汉人缪印篆法，整印敦厚朴实，率真自然，这也是文人印家的境界。此印置于文房，亦将毫不逊色。作为金融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是账册的美名，又是一方让人遐想的宝钞用印，传统文化生命力之强盛，于此可见一斑。

“兴利图章”则是一方典型的清末民初钱业用印，既可以作押款章，也可以作骑缝章，是钱庄银号不可或缺的一枚实用印章。黄杨木质，规格为4x4x5cm，方形无钮，四层花边框。正中间是楷书印文“兴利图章”四字，围绕四字是长城纹边框；外面是一圈文字：“九府之法，本自太公，成形天地，百代相沿，则财恒足”，记录的是姜太公作为货币制度开山鼻祖所创制的“九府圜法”，点出了该印的行业身份，有追根寻源认祖归宗的意思。“九府圜法”外是光芒纹加城垛纹两重框；最外层花边是花瓣纹图案，中间嵌刻十二字“行日布，流日泉，取无禁，用不竭。”与中间层的“九府圜法”相为表里。姜太公的钱法理念流行了几千年，现代社会依然秉持此法，钱业传统深厚及观念故旧于此可见一斑。四重花边图案的选择与当时青花瓷器上流行的图案基本一致，时代特征明显。整印文字大气挺劲，花边精致美观，堪称印章史上的佳作，置于文人印的谱籍中亦是毫不逊色。

钱业老印章是秦汉印的嫡传，其形式上的创新迥异于整个文人印章史，因为其在金融票据上的作用极为重要。银钱业对印章的重视程度也超出伧辈。蒙尘已久的金融老印章，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正在渐渐浮出水面，既为金融界所重视，同时也进入了收藏者的视野。

中国学者听说我来自槟榔屿，好奇地提问：“来自槟榔岛的你，是否也吃槟榔？”

这问题对我很陌生，也许可以用很清新，住在槟榔屿的我，和很多槟榔人一样，脑海中不曾想过“吃槟榔”这回事。

学者告诉我，清朝时，槟榔是属于皇族和官家的零食，以槟榔子做成蜜饯，放在精致的槟榔盒子，宴会或交游时，当成礼品互相馈赠，到今天湖南还有槟榔蜜饯。这个对我确实新鲜，听也没听过。至于在海南，槟榔的吃法是先把槟榔子削成瓣状，包在桉叶里，配上石灰膏和烟丝，放入口中咀嚼。学者听吃槟榔者的经验谈“越嚼越香，并有提神作用，感觉颇似喝酒，令人脸色发红而精神焕发。”据说，学者强调，常吃可防病治病，尚有美容功效。于是某些族群同胞将槟榔当成健康长寿食品。

我八十年代到台湾探望在那儿念大学的弟弟和妹妹。过后参加环岛观光时，开着旅游车的年轻司机样君子忠厚老实，听他说话学历应该不高，可为人爽快，一路上滔滔不绝给我们介绍景点以及当地的美食。

从他的语气和言词，便很清楚他极爱这个土地。每个景点介绍过后，就要加一句“台湾很漂亮，是不是？”美食吃了，他自己先陶醉：“真的很好吃，你们说对吗？”还竖起大拇指指作赞扬姿态。

半路停下休息时，我们自洗手间出来，发现司机竟然吐血！一地血迹斑斑，我们面面相觑，不敢当面说出口，却一路替他担心。他似乎毫不在意，可是，我们清楚地看见，他的嘴角，牙缝都有鲜血血迹。后来他把车子停在路边，说等我一下。待他走回来时，只见他嘴巴不断地咀嚼，好像很享受那滋味。上车后，他从身上掏出一颗什么东西，问：“你要不要尝尝？很好吃的。”旅游中向来好奇的人，无论什么东西却只想了解，绝对不轻易放进嘴里。“这，这是什么？”慷慨的司机充满鼓励：“吃一

朱拉

## 醉槟榔

个，你吃一个看看，味道很好的。”然后才回答“这是槟榔。”

回去的其中一人是敢死队队友，尤其关于吃的，什么都不放过。他拿过来看一看，就放进嘴里，等他嚼了一会儿，问他什么味道？他继续咀嚼，努力再感觉了一下，说：“怪怪的，有点辣，有些涩。”低声批评——“不好吃。”

后来我的台湾朋友告诉我台湾人吃槟榔的方式，把槟榔的果蒂剥去，切除较老的部分，再以带有胡椒香气的桉叶，把搅匀的石灰涂在叶上，卷起来，放入切开的槟榔中间，一起嚼食。这三种物品混合后即呈红色，所以吃槟榔的人，吐出来的不是血，而是咀嚼后的槟榔汁液。咀嚼槟榔可令血脉舒张，暖洋洋如喝啤酒，具提神作用，许多长途司机就因为这样养成习惯。

血红色的槟榔记忆继续向前走。小时候住在马来人的“甘榜”，“甘榜”是马来文，意思是村庄，但这里其实是离城市一步之遥的马来人聚居的一个小区。我家正好和一户马来人同一个院子。华人住前院，屋旁短短一条小径，沿着种满五颜六色鲜花的篱笆走过我家后门，便看见马来人阿依家的前门。

屋子有两层楼，楼下空间摆置杂物，通常摆着木柴，煮食用的火烧柴。楼梯旁边有个小水缸，谁要上楼都得先脱鞋，然后用椰壳勺子在小小水缸里盛水洗手洗脚，才可到楼上前厅。阿依的妈妈时常坐在前厅吃槟榔，笑着叫我们，来坐坐坐。说的是马来话，有时候也以闽南话叫我们别客气，上来坐坐，但她懂得比较少，不像阿依，和我们完全是闽南语沟通。

阿依的母亲人长得高，双眼皮的眼睛非常明亮，长形的脸，下巴尖尖，上扬的嘴角可能是常带笑容的缘故，总眯着眼睛叫我们坐下坐下，她多数时候仪在胸前围一条花沙笼，像长袍一样直到脚踝，不穿上衣的母亲，不在厨房便坐在前厅地板上，双脚莲坐，面前摆一个槟榔盒。小孩看槟榔盒，犹如一个玩具，又有点像玩家家酒的小道具。长形铜制品的槟榔盒上，一排有盖的小杯子，很喜欢一个一个打开来看。阿依的母亲先把一瓣槟榔放在一张桉叶上，然后打开小杯子的盖子，用一个小匙，每个杯子里的白色红色调味料加一些，把槟榔包起来，放在嘴里咀嚼。一直到我去台湾以后，才晓得阿依的母亲在槟榔上面加了什么东西，也明白阿依母亲永远红色的嘴唇和牙齿的原因。

网络时代增加了我对槟榔的知识，原来印度人爱吃槟榔，最佳搭配是桉叶和石灰。印度人也是将槟榔果取出切碎，加了石灰，用桉叶包裹后，放进嘴里咀嚼。说是味觉刺激，有提神作用。另有一说，“从医学角度看，具有一定药用价值，可用于帮助治疗气管和肺部疾病。桉叶与槟榔搭配，将会极大刺激唾液腺和嘴巴的黏液薄膜，让人在炎炎夏日感到清凉。”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久吃会上瘾。

现在回想起来，根据体型和外貌，阿依的母亲应该是印度人，难怪她有嚼食槟榔的习惯。她轮廓分明的脸，可以入画，而且体形高，眼睛大，只是因为她和我们的对话一直是马来话，我就把她误当作马来人。

中国学者还特别告诉我，苏轼写过槟榔诗“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依是醉槟榔”、“暗磨著人簪茉莉，红潮登醉醉槟榔”。诗写得美，但我想，这并不表示鼓励大家吃槟榔吧。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 “装糕”和上海方言

褚半农

用糯米粉做的蒸糕，在上海郊区品种各有不同，如闵行颛桥有桶蒸糕，莘庄和松江九亭、泗泾地区有方糕等等。逢年过节，纸媒上与糕有关的文章多起来，但一旦把做糕过程写下来，却常因涉及到一个方言特色动词的写法而时有差错。前不久，我还接到朋友电话，询问此字到底有没有。我回答有的。这个特色动词沪语音“壮”，写下来就是“装”，做糕的过程称“装糕”，我们从小一直听大人这样说。

我曾在某报刊发《母亲“装糕”》一文中得知，嘉定农村春节也做这种糕，从叙述内容来看，做糕的用料、过程、方法以及使用的方言词语，都和我们这里相同，只是作者用了“装糕”一词。这里的“装糕”是“装糕”的误写，明显是作者不知有“装”这个动词，才不得已而为之的，我以前也碰到过，完全可以理解。“装”字是用于蒸做糯米粉糕的专用动词。以前我在用到这两个字时，也不知道“装”字怎么写，字典上也查不到。想想用“装”字么，读音不完全相同，意思也不对；如写“蒸”么，又不能包括做糕全过程。后来因研究上海方言，我在阅读其他古代文献时，终于“捉”到了这个“装”字，也感到我们先人用词之准确。

“装”字是个十足的古字，按照《康熙字典》引明代梅膺祚《字汇》释义，可以得知“装”的词义是“熏蒸也，今炊粉糍（糍）谓之装糕”。“装”字就是为做糕全过程“定制”的一个特色动词，读音，释义也对，几百年过去了，还是这样；或者说，这个语境下的“装”字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但除拙著《莘庄方言》《上海西南方言词典》外，其他方言词典都漏收这个常用动词。

装糕还连带出另一个特色动词。因装糕要用糯米粉，在正式“装”之前，粉里要加糖水后并不停地揉搓。这个过程官话称“和”，如“和面”，方言中另有特色动词：渡。因为是为“装糕”，所以也称“渡粉”“渡糕粉”，而“和面”称“渡面”。糕粉“渡”得好不好，会直接影响到糕的质量。我记得过去母亲每年装糕前，都要花好多时间来“渡糕粉”，整个过程可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丝不苟。“渡”字在《康熙字典》中有个义项是“水调粉面也”，完全同“渡粉”“渡糕粉”相符。一千五百年前的南朝，苏州人顾野王曾编过我国第一部以楷书为主体的字典《玉篇》，《康熙字典》中“渡”的那个释义，就是引自《玉篇》一书，比“装”字的出处还要早八百多年，又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古字。民国《嘉定县志》、民国《宝山县再续志》等地方志中也记有这个义项的“渡”字，并附例句，表明其流传有序。如再上溯，还可从《齐民要术》找到例句：（切面粉）“刚渡面，揉令熟”（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1页），1935年苏州人陆基收集编纂的《苏州同音常用字汇》中，也收有“渡粉”。（丁邦新《一百年前的苏州话》第105页，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今天使用的上海方言，成分组成非常复杂，这是历史发展造成的。有些读音，我们今天感到怪异，可能恰恰是古代读音的遗存，如浦东的姚家浜，原名王家浜，而王字读如 yáng，就是古音，宋初徐铉校定《说文解字》时明确记为雨方切，即 yáng。有些词语，因生活中常用而习以为常，可它们来自古汉语。大家熟知的《孟子》中有“授受不亲”，其中“授”“受”两个动词在松江府原住民方言中至今常用，且同音同义。在流传过程中，某些读音和词语在有些地方消失了，却保留在沪（吴）语中，尤其在农村方言中保存得更多，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珍贵遗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源。“装”“渡”两个特色动词，从文献记载看，当年流传的地域范围要比现在大得多。在上海农村方言中现在还一直在使用，只不知是否还保存在苏州方言中，因为语言学家李荣主编的《苏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中没有“装”“渡”的身影。

巷，是时光留下的身段，巷，是过客曾经的逆旅。

巷在上海，也叫弄堂。但我喜欢叫“巷”，因为更有文学味。两排房屋，门对门，窗对窗；中间的小路，既飘过运赛时乖之际的怨声，也亮过春和景明时节的暖色。木门，铁门，“吱呀”一声打开，走出儒雅的身影；方窗，方窗，“吱呀”一声推开，露出青春的险峻。

近日，我有事路过一条巷子，这是我从童年到成年，住了近三十年的地方。虽然我早已搬走，却对旧地有着眷恋。

“喂，里面已经没有人住了！”巷口有人提醒我。

我的惊愕，此刻是满满地溢出在脸上。巷子建于辛亥革命前后，属于英式联排里弄建筑，都说有保留价值。不料，还是免不了，动迁了。

往日热闹的里弄，现在成了空巷，门窗封的封，关的关。唯有建筑依旧：墙面呈淡淡的橘红色，券石石嵌在壁柱上面，屋顶是瓦片叠成的斜坡，坡上立着老虎窗，像一只只蹲踞着的，张开大嘴的兽。

巷子的地面，印有我童年的足迹。那时是解放初，一整个地面，坑坑洼洼，正好让我们小孩子打玻璃弹子。打“堂弹”，必须在一个坑内，越出坑界，就算输的。后来地面填平了，游戏也变成“造房子”、“老鹰抓小鸡”了。偶尔有盲人老者走进来，兜销小商品。他身上斜挂布袋，袋里鼓鼓囊囊，一手搭在他老婆的肩上，张开喉咙，沙哑地叫道——

“各位老太太小姐，各位大先生少爷，看我瞎子苦惱，帮我瞎子买点啊。汰衣裳板刷、马桶甩洗，阔条子刨花、老鼠夹子……”



笔墨贺岁

## 笔会

花开有余  
(国画)

朱拉

## 我的老巷

朱大路

他老婆也附和道——“买点啊！买点啊！看我瞎子苦惱，买点啊！”这时，有不少居民走过去，多多少少，买点，出于需要，也出于同情。风纯电动，人情不薄，让我感动。多年后，我把它作为一个盲人的梦，写入了长篇小说——《三教九流》。

沿着巷子，缓步走。对了，38号底楼，当年是幼儿园，我母亲在此当过教师。门前，曾有一块水泥地，长方形的，专供幼儿们游戏。母亲慈祥，耐心，教育方面有一套。做个好老师，是她平生的梦。

走过去三个门牌号，门口一块牌子——“创造社出版部旧址”，静静地挂着。学生时代，我读郭沫若自传，他写道：创造社出版部设在北四川路麦拿里。呵！麦拿里不就是我住的这条巷子么？在几号呢？我无从稽考。十多年后，我读到消息：在41号。区政府将它归入历史遗址，作为纪念地点，挂牌保护。创造社，“五四”文学精神的火山喷发口！多少激情澎湃的作品，都是通过一本本书和刊物——这个出版部编辑的——流向了世界。1928年1月，出版部迁到麦拿里41号。有人说：“创造社的一班人，个个都带有浪漫的气质，不大高兴亲身实务。”而出版部的小伙伴们，都是认认真真的实干家，受到郭沫若称赞。是啊，既有翱翔云端的瑰丽文

思，又有脚踏实地的编务工作，创造社的“文学梦”才插上羽翼，腾飞了，腾飞了。有一天，张资平、郑伯奇和王独清，还在41号的二楼，与小伙伴们开常务会议。他们谈了什么？此刻，我抬头，朝二楼仰望，真想拾掇当年会议的花絮。

这条巷子，专家学者多，每个人的梦里，都系着文化的彩绸。当年，5号姓张的数学教授，缓缓走在巷子里，他在思索哪道数学难题呢？27号姓鲍的翻译家，倚在二楼窗口，向我微笑，他新出了什么译著呢？9号姓刘的书法家，带我去他家，看他挥毫。对了，他就是刘一闻，兀兀穷年，终成高手，在当今书坛，笔势纵横，别树一帜。

再走过去，是块空地。25号原先就在这里，可惜现在已拆掉了。这里以往居住的主人——褚辅成，有着一腔“报国梦”：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有他；与秋瑾在嘉兴密商反清起义，有他；参加辛亥革命，光复浙江，南下护法，有他；1932年冒险掩护被日寇通缉的韩国抗日志士金九，有他；抗日救亡，创建九三学社，有他；1945年7月赴延安访问，商讨国是，有他。我1952年搬进23号时，25号门口的门楣，有四株长青。从春鸟啾啾，到冬日凛冽，我常在树外面的空地上打太极拳。褚伯母偶尔也会观看，手挥两下，表示出对太极的好奇。

后来，褚凤仪去世了。再后来，褚伯母也走了。褚辅成的遗物被拉走了。网上说：“运输工人不知道这些资料的价值，所以纸片撒满一地，其中，就有秋瑾、蒋介石写给褚辅成的信。”

纸片撒了，史料散了，人影褪去了，声音沉寂了。人间事，世上人，终究留不住的。唯有夕阳落下时，各家厨房内，曾经散逸出的饭菜香味，仍丝丝缕缕，飘在我的梦中。

旧户已然撤空，新梦即将起笔，色彩会变，韵脚依然。有记忆，有梦的季节，世界不会冷清。